

# 史家著书铸国魂

陈兆肆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史学专家随高校内迁，辗转来到云南。在这一方热土上，他们以笔为戈，著史立说，阐发民族大义，唤醒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忱，对万千民众献身于抗战大业，起到了非同小可的激励之效，对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也产生至深至远的影响，正所谓“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存亡绝续之交，史学之用，无有过之者。

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史大纲》，虽脱胎于1937年前于北大四年的通史讲义，但最高成书却在抗战时期的云南。此前在北大每上一课，钱穆必提前一日写录好所需史料，久之而积得五六本厚册。后来随学校辗转搬迁至湖南南岳、云南蒙自，仍笔耕不辍，续有增写，这便为后来成就巨著奠定坚实基础。《国史大纲》真正完成就是在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期间，其于1938年5月10日动笔，1939年6月14日终稿，费时十三个月。在这十个月，钱穆远避城居之喧嚣，除半周在昆明城内上课外，其余半周则居住在城郊宜良。因朋友介绍，孤身借居于当地县长在岩岸下寺之别墅，谢绝人事，专心撰述。别墅之旁，有白兰树一株，春暖花开，香飘飘逸，沁人心脾。而岩岸寺所在的小山，又有清泉昼夜喷涌，水流潺潺，漱激于石，声如环佩，叮咚作响。钱穆山居期间，每日早、晚，上山散步，其余时间白天在小楼著史，夜则阅读《清史稿》。山寺异常清幽，最适合静心读写，但未免孤寂，史家陈寅恪偕汤用彤寒假来访，曾借宿一宵，陈氏感此寂靜之地诚属难得，颇为适合著述，但也戏言设若自己独居于此，“非得精神病不可”。然而，钱穆却能拂却一切盛情之邀，耐此孤寂，潜心撰史，置身于离乱之时，钱穆徜徉于宜良山水之间，似暂时超越现实世界，正如他游石林瀑布时所言：“徘徊流连其中，真若置身万世宇宙，宇宙非此宇宙，人生亦非此人生。”然而，民族忧患在

其心中，无时无刻。《国史大纲》一书，对民族之过往，抱持深深的温情和敬意，倾注民族感情，贯注民族精神，故于当时国难方殷之际，颇起振聋发聩、唤醒民众之效。书成后，一编风行，洛阳纸贵。

早年因“古史辨”而名声大噪的顾颉刚，于1938年10月至1939年3月间，受云南大学熊庆来先生之邀，就任史部教授，兼任昆明北平研究员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顾颉刚偏居于昆明北郊浪口村，郊野清静，虽形影相吊，但闲暇之余，肆力于文，写下所见所闻之民族风情和民俗习尚，再证诸中原古史，遂成书《浪口村随笔》。此时，顾颉刚甚“暗合时势，激人团结奋进”为鹄的，编写《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讲三皇五帝夏商周之历史演变，示读者以中国最初之模样。受事业心的激励，顾颉刚还在昆明《益世报》创办了《边疆》周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主张通过历史与文化整合，消弭民族之隔阂，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性，为当时中华民族之认同提供重要的学理依据。顾颉刚还充分利用云南丰富的人类学、民族学才遇，深入昆明维则、禄丰、宜良等地，进行民族调查，取实物与遗文互相印证，探索边疆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值此中华民族深陷危难之际，顾颉刚放弃了早年“为学术而学术”之心，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不断寻找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迹。

晚年归于平淡的法史大家瞿同祖，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便以《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蜚声于中西学界。这本被誉为法史学界的经典之作，是在抗战时期的云南写成。1939年夏，瞿同祖从重庆辗转来到昆明，受吴文藻和费孝通之邀到云南大学执教，此后又兼课于西南联大。授课之余，瞿先生旁搜博讨中国法史资料，“伏案读写，敌机不时来袭，有警辄匆匆挟稿而走，时作时辍，倍平日之劳，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不断寻找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迹。

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内在结构，于书中可以窥及，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给予中国社会深厚的法文化滋养，助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

一代天才史学家张荫麟自1938年夏来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任历史和哲学两系双聘教授。张荫麟初到昆明，时值溽暑，暂住安宁碧玉泉小憩。学期伊始，搬到城内，住在吴晗家里。在昆明期间，张荫麟努力撰写《中国史纲》，其在《自序》中以乐观的笔调写道：此次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在战争中受到洗礼，团结奋进，摆脱过往一盘散沙的局面，以创造“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而值此分水岭，以通史的眼光，回顾“全部的民族史”，并前瞻“它所指向的道路”，以供国人在空前大转变时期有清晰的认知，增强自信心，正是史家分内之事。

1940—1941年间，以《战国策》及《大公报》的“战国策”专栏为学术舞台，在昆明汇聚着被时人称为“战国策派”的一代史家群体，其间以海宗、林同济为代表。他们鉴于国势日蹙，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唯实政治”及“尚力政治”，对英雄和强权人物倍加加赞扬。1940年，雷海宗在昆明出版《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以探究中华民族盛衰之轨迹及其成因，乃其系统检视和研究中国尚武文化传统的集成之作。战国策派的相关论述，与近代以来汲汲于自强奋进的理念一脉相承。虽其推崇“超人政治”的主张，无不非理性一面，为人所批评，但在当时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和尚武精神，无疑对甚嚣一时的“恐日症”“求和论”“速亡论”，具有镇静解毒的作用。

史学家陈寅恪追随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辗转，先至蒙自，再回昆明，住在青云街花巷三号院。上课之余，埋首读诗和灯下著史成为陈寅恪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他节衣缩食，购买《新唐书》，克服眼疾，阅读并作批注。在书荒之际，他细读《通典》，病中写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

稿》。此部著作命运多舛，在从上海寄往香港付印时，毁于日本炮火。后在朋友帮助之下，将旧稿凑成而出版。为弥补此书详于制度而略于政治，陈寅恪又以唐代政治为范围，着手撰写《唐代政治史》。在云南跑警报的岁月里，陈寅恪以棉被包裹《唐代政治史》手稿，躲防空洞，视手稿如同生命。尤值一说的，是陈寅恪晚年“颂红妆”的两部著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虽其成书不在云南，但皆与云南渊源颇深。弹词《再生缘》，本即写元代云南昆明城中孟、皇甫、刘三家的爱恨恩仇。尤其是《柳如是别传》一书，其撰写缘起与云南直接相关。当日陈寅恪在云南买书，意外从书商处购得常熟白茆港钱谦益旧园中红豆籽一粒。自是引发陈氏重读《钱谦益集》，藉以温旧梦，寄遐思，同时自验所作之深浅。由此结缘而写的《柳如是别传》，费如许笔墨，写柳氏离开降清之钱，为反清复明奔走，后自缢而亡，旨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表彰民族独立精神的用意，实际贯穿于陈寅恪著述之始终。

在云南大后方，风光之迤邐，乡居之清幽，边地之风情，都有助于抗战时期寓滇史家著书立说，开辟新境，阐扬大义。不过，当时在云南，也有学人格于时势，著书未成有遗憾，而时任西南联大总务处的郑天挺，即其中显例。因时局板荡，困于书荒，再加上冗务缠身，郑天挺常常喟叹“不能作深湛之思”，故其许多著史计划，虽久欠蓄诸胸中，但最终未完成，如据按《资治通鉴》优美词藻而成《通鉴属辞》，准备了八年之久的《南诏书》，还有《史传纂例》《明书三十志》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 金石铭刻研究领域的创新突破——评张锡禄《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整理研究》

陈子丹 李雯

史料文献整理是支撑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基础。方国瑜、方龄贵、汪宁生、孙太初等前辈学者在云南金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著录方面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不仅为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的搜集整理工作提供了科学的借鉴样本与指导性的思路方法，也为后人开展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白族著名学者，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研究专家张锡禄先生40余年来深耕南诏大理国历史和白族文化领域，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与文献考据著称，其研究路径突破传统史学框架，结合碑刻、文物、家谱和民间文献，系统梳理了南诏大理国的政治、宗教及民族关系，提出了白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四重证据法”，其代表作有《元代大理段氏总管史》《大理白族佛教密宗》《南诏与白族文化》《南诏王室婚姻关系简论》《大理历代名碑》等。

张锡禄先生在多年开展田野调查实践，实地踏勘寻访南诏大理国金石文字遗存的基础上，遍搜各种拓本、录本，参校识读、勘定原文，详加考释、辑录铭文并附拓片照片，编著《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整理研究》一书，2023年11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24年8月在大理大学举行了新书的首发仪式。

该书辑录唐宋时期由云南少数民族建立的五个边疆地方性政权——蒙氏南诏国、郑氏大长和国、赵氏大天兴国、杨氏大义宁国、段氏大理国的碑刻铭文共107通（件），对每通碑刻铭文进行编号、背景介绍、全文录文，并配有高清的原件拓片（或图片），是近年来最新问世的一部精校细勘、订补翔实的南诏大理国碑铭文字合集，也是目前系统整合散佚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最全、最多、最广的金石铭文专著，为大理白族地区金石铭刻资料的分类整理及开发利用作出了创新性贡献。

通观全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编排体例新。全书主体内容分为4个部分14章，27万字，采用概述—还要—分类辑录三大框架结构。

第一部分概述：在概括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背景、南诏大理国疆域范围、碑铭价值和意义、碑铭发现和著录简况、相关问题研究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和综合论述。

第二部分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述要：按地方民族政权分期对碑刻内容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度解读和详加考释，内容包括唐代的南诏国，与五代十国相始终的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过渡时期，以及宋代大理国碑刻铭文的出土时间、发现地点、碑铭年代、保存状况、尺寸大小、材质形状、行款格式、文字内容、著录情况、特点价值等方面。

第三部分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分类辑录：按政治类、经济及交通类、宗教类、墓志铭四大类分别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碑碣、题记摩崖、纪年砖、造像记、发愿文题记、铜钟款识、观音铜像铭文、雕像铭文、铁柱题款、刻文铜板、御质铭文、铁质铭文、御镜、官印、砖铭、瓦铭、塔铭、墓幢、经幢、墓碑等进行辑录，内容包括题记、编号、题解、原件拓片（或图片）、录文5个部分。

正文后还附录《南诏大理国年号及对应正史纪年》和最新公布的《南诏大理国纪年表》，便于研究者对照查证，为历史年代考证和编年史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是资料收录全。此前只有汪宁生著的《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一书收录了该时期的此类碑铭13通（件），而该书共收录107通（件），新增94通（件）。这些碑刻铭文的来自古籍记载，有的来自考古发现、田野调查或民间收藏，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全面、最广泛、最丰富的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集成。

三是研究方法新。分类采用碑铭内容与石材形制相结合的方法，分为政治类、经济及交通类、宗教类、墓志铭四大类；编号在每个大类中按其形成的时间顺序编号，无确切时间的归在类末，以N代表南诏、D代表大理

国、BM代表碑铭。整理采用“编号—录文—拓片—考释”的四维整理模式，既保留金石文物的原貌，又采用数字技术（如拓片图片数字化）进行加工处理，方便读者识读和大数据文献采集；辑录对每通碑刻均标注编号，附有背景介绍、原件拓片图片和碑文校录，既有对碑文拓片的选择、内容的取舍，又贯穿点校、转录、加工、编排等工序。

研究方法上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法，不仅结合考古学方法呈现碑刻实物与文献互证，还基于民族学、语言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视域，开展多语种、多语言文字（汉文、方块白文、梵文、藏文）的分析研究，涉及碑文中以汉文为主导的官方公文用语（如《德化碑》既彰显归附中原的政治诉求，又隐含地方政权的主体性）、方块白文（梵文）的地域性应用（如用白语记录人名、地名）、梵文在滇密传播中的普及等问题，藏文仅见一例，为多民族文化交融提供了实证。

四是史料价值大。唐代乌蛮和白蛮建立的南诏以今云南为基本统治范围，延续254年，是与突厥、吐蕃、回纥并列的重要地方政权；白蛮建立的大理国，以今洱海地区为中心，统治长达317年，是与宋朝并立的南方唯一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作为唐宋时期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持续了500多年的历史，但南诏大理国史料在中原王朝正史中的记载稀缺（如《宋史·大理国传》仅有602字，简略记载了宋徽宗政和年间大理国遣使朝贡之事）。碑刻铭文作为重要的“第一手史料”，为研究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交通、宗教语言及民族关系提供了实证依据和核心材料。如：《南诏德化碑》是云南现存最大的唐碑，堪称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南诏史。记述南诏统一六诏，与唐王朝关系及天宝战争，强调边疆民族对统一的渴望，不仅是研究南诏政治与民族史的核心实物，也是唐蕃关系史研究的主要依据，反映出8世纪中叶吐蕃与南诏开启结盟前后的双边关系及其对整个西南局势走向的影响，折射出南诏与吐蕃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关系及其动态变化特征；《大理国与三十七部会盟碑》作为我国仅存的两块古代民族盟誓碑之一（另一块是《唐蕃会盟碑》），不仅是研究大理国及当时滇东乌蛮三十七部的珍贵资料，也是西南各民族“三交”的重要实物见证；《药师祥妇人观音好爱造像记》等宗教碑刻揭示了佛教本土化与多民族信仰的融合；《大理国洲公塔之碑铭并序》铭文的文体富有儒学思想与佛家哲理，是儒释结合的经典之作；《大理国永昌府三宝弟子盐庄杨淑容墓志》为汉文、梵文合璧，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特征。这些珍贵金石铭刻为公众打开了一扇窗口，从中得以窥见唐宋西南各民族的历史演进与文化交融图景。

五是编排相結合。从史料学、编纂学的视角看，该书既有“述”又有“论”，既有“编”又有“研”，既是资料录，全面整理、系统归集南诏大理国金石档案的汇编型研究成果，也是实证研究、跨学科交叉研究及理论与方法创新的研究型学术专著，是近年来云南省乃至全国在金石学、史料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就唐宋时期西南边疆多民族关系而言，该书不仅有助于探究南诏大理国的民族政策、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而且为深入挖掘西南各民族“三交”的历史事迹提供了难得的重要史料，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史料文献价值。

总之，《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整理研究》一书不仅是近年来国内民族古籍整理、金石铭刻研究领域的创新性力作，更以其全面系统的原始文本呈现，重构了南诏大理国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地域文化传承具有示范意义，堪称南诏大理国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其学术性、资料性、权威性、可读性和观赏性使其成为历史文献学、金石学、档案学、语言文字研究者及地方民族文化工作者必备的参考书。

（作者1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作者2系云南省民族宗教信息中心主任）

## 讲好文物古寺故事 推动文化遗产保护

——以云南姚安龙华寺为例（上）

江燕

如何讲好文物故事，触摸沉寂的历史，感知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振兴，这些话题关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本文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云南楚雄姚安龙华寺为例，从相关文物建筑、碑刻、楹联等为切入点，透过文献记载，讲述其背后几个不为大众知晓、有后续、有温度的人文故事。

龙华寺，又称活佛寺、卧佛寺，位于云南楚雄姚安绿古镇龙华山。始建于后唐天祐年间（904—907）。元灭大理段氏相国高泰祥殉国，其女出家于此庵，后高泰祥长子高承授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总管，改建其庵，更名龙华寺。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座姚州城，半部云南史”。姚本古哀牢国，唐虞为昧谷近地，夏《禹贡》梁州之地，周合梁于雍，亦为雍州域，其地曰百濮。春秋战国时属楚，顷襄王使庄蹻兵略巴、蜀、黔中，西至滇池，以兵威定属楚，欲报，会秦击楚，道塞不通，以其女亡，擅滇王之，而庄蹻为楚王苗裔，滇王又为庄蹻之后，郡有楚俗，始此。秦使常頌略五尺道，置吏。汉置益州郡，领犍南（古姚安县名，西汉元封二年置）、蜻蛉诸县。蜀汉改属云南郡。晋初因之。晋武帝泰始七年（271年），分益州，置宁州，领云南郡、东、永、陈、俱属宁州。隋杨帝大业中，置总管府，遥制其地。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置南平等羁縻府九十二，隶戎姚吐浑都督府，贞观（621年），以古滇国多姚姓，因置姚州都督，置州十三，天宝间蒙氏据之，改为弄栋府。五代时，段思平改为统矢逆，又改为姚州，亦曰姚府。高升隆封其子高隆政为演习，世有其地（高氏一支，姚州望族，元明清三代为世袭土司）。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鉴唐之祸，奔画奔之，遂与中原绝。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蒙古忽必烈灭大理，段氏降，斩高泰祥于五华楼，立统矢大姚县，高承授长子高隆政为演习，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降府为州，属大理路，改大姚堡千户所为大姚县，仍属姚州。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复升为姚安军民总管府，为云南行省三十七路之一，治在光禄古镇。是一个军政合一的管理机构，最高长官称总管。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改为姚安军民府，领姚州、大姚县。清乾隆后改为州，属楚雄府。

历史上，姚州曾一度属广州，地理战略地位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西通大昌，南通交趾，是进出邛笮（今四川省西昌一带）、连接滇洱（今云南昆明、大理地区）的咽喉之地，“姚虽僻陋，实西北之门关、地接笮，本南中之锁钥”，“东有金沙江之利，西接云南州之胜，距威越，瞰点苍，最为险要”，“府道通越嵩，络绎滇洱，为南北之要会。……盖自姚安而北则渡金沙入越嵩，自姚安而西则沿叶榆趋大理，自姚安而南则出威越向昆明，郡为全滇之要会。西南有事争于滇蜀间者，自古恒在姚州也。”要想控制和稳定南中

地区（泛指今四川大渡河以南、云南全境、贵州西部地区），姚州都督府之得失事关全局。唐设姚州都督府，在省会之西北、大姚县之南、定远县（今牟定县）之西、镇南州（今南华县）之北，通达四川（邛笮）、滇池（拓东城）、洱海（叶榆）之间，设立目的就是让中原王朝通过此门户绥抚六诏。正是在姚州都督府的支持下，南诏坐大，打败五诏，统一洱海地区，最终促成六诏的统一，为后来的边疆巩固、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有“六诏之中分，三川之门户，南中之锁钥”之说，形容姚州的重要战略地位。

姚州去中国万里，水土既殊，风俗亦异。“崇山峻岭，平畴广川。饶麋鹿鱼鳖之利，其土宜黍麦谷稻，其民尚美，俗尚善事。”士大夫乐谈名理，弦诵相闻，风声朴茂，为“西邇文献邦”“与中土等盛”，它作为历史上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和南北东西商贸往来的要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汲取着外来先进文化的传播，吸引着各地文人士的关注。先后有司马相如、骆宾王、李善、李贽、徐霞客、杨慎、钱谦益、李元阳、纪晓岚之父纪容舒等官员文人到过姚安，或留下名篇佳作，或在姚安任职，政绩不凡。而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的清姚安府世袭土官高荫映，曾任翰林院编修的刘荣谿，甘雨、甘孟贤、甘竹贤、甘叔贤、甘季贤父子，两道台赵子骥、马驷良，滇中巨擘由云龙、滇中名士赵鹤清等人，承前启后，使姚安文脉，大放异彩，对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带来繁荣和发展。

### 故事一

文脉传承，一楹一联透性情。登上龙华寺，迎面牌楼式的山门两侧题写有一副楹联：“佛生极乐世，山僻大唐年”。落款署名“由人龙”，题于民国十年（1921年），但网上及许多相关报道多署名“由云龙”，由人龙是其从弟。故特别指出，予以纠正。

由人龙（1877—1944），字由龙从弟。

字瑞熙，清庠生。1904年与唐继尧同批入日本振武学堂学习军事，因奔父丧，回乡守制，服满复渡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习法律。历任保山县知事、腾越道尹，兼海关监督，1911年辛亥革命后，入黎天才师任参谋，参与了光复上海、南京之役，后移师援鄂有功。云南重九起义后，由人龙应滇督蔡锷之约，回省任督署军法处处长。1915年以护国之役，坐镇边陲，功献卓著，任保山知县。1917年任腾越道尹兼交涉使，在任三年，惠政极多，对内勤于建设，筑坝坝、兴水利、广学校、育人才、济民困。当时乡人走夷方者，多染瘴患病，由人龙亲设医药，尽力医治，皆得痊愈而归。穷困者，酌情发给旅费，死亡者，代为殓埋，行之数年不倦。1923年改授广通、易门、禄丰、安宁、罗次五县团务监督。1926年充唐继尧司令代表，赴沪、宁接洽，漫游粤东，返苏、宁，留苏州者数年。积极促进家乡建设，捐俸三千金，设立姚安平民工厂，多置纺织机器，以教里中男妇之失业者。在乡多主禁绝烟毒。晚年归里，值长期抗战，兵役、工役、运输，力主公平。又倡修宝山通甸南大路千余里，以利交通，协助其兄由云龙编纂《姚安县志》。保山人民至今利赖，于县城盐市口公立《棠棣碑》，以纪去思，并载人县志，对外他详考边陲，赴查爱案，力争主权，累抗英领馆人员之暴行，撰《蛮爱会案国防日记》，为言边务者所不可忽视。蒋国治应其嫡长孙嵘之嘱，撰《重修腾越道尹由瑞熙墓志铭并序》，铭曰：

赫赫由尹 辛亥功臣 为官清正 勤政为民 外抗强暴

内施德政 民族恩冕 拔萃超群 谦谦君子 人中麒麟

现遗址有由人龙墓，位于姚安县栋川镇长寿村村委会上村一组由民坟山上，为古式三碑六柱，坐西朝东，墓碑为大理石，碑柱为二龙戏珠，墓碑撰文由原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陈明撰写。整体

